

· 上海政法学院学术文库 ·



市民化还是属地化：

失地农民身份认同的建构

孙频捷 ·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市民化还是属地化：

失地农民身份认同的建构

孙频捷·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市民化还是属地化：失地农民身份认同的建构/孙
频捷著.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3

ISBN 978-7-5520-0290-4

I. ①市… II. ①孙… III. ①农民问题—研究—中国
IV. ①D42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08191 号

市民化还是属地化：失地农民身份认同的建构

作 者：孙频捷

责任编辑：刘 佳

封面设计：闵 敏

出版发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

<http://www.sassp.org.cn> E-mail:sassp@sass.org.cn

经 销：新华书店

排 版：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上海信老印刷厂

开 本：787×1092 毫米 1/16 开

印 张：12.75

插 页：2

字 数：228 千字

版 次：2013 年 6 月第 1 版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20-0290-4/D·248 定价：3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上海政法学院学术文库》

编 审 委 员 会

主 任：金国华

副主任：闫 立 倪正茂

秘书长：何平立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明华 王 蔚 刘 强 闫 立

关保英 汤啸天 杨 寅 吴益民

何平立 张森年 金国华 倪正茂

章友德

《上海政法学院学术文库》

总 序

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学术文化传统，两千年前儒家经典《大学》即倡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其意即涵蕴着彰扬学术、探索真理。而《中庸》论道：“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则阐释了学术研究的治学精神以及达到真实无妄境界的必由之路。因此，从对世界历史进程的审视与洞察，社会发展、科学昌明、思想进步，从来离不开学术科研力量与成就的滋养与推动。

大学是国家与社会发展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而科学研究的水平则又体现了大学的办学水平和综合实力，是一所现代大学重要的标志。因此，一个大学的学术气氛，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引导着学校的科研状态，而且渗透和浸润着这个大学追求真理的精神信念。这正如英国教育思想家纽曼所言，大学是一切知识和科学、事实和原理、探索与发展、实验与思索的高级力量，它态度自由中立，传授普遍知识，描绘理智疆域，但绝不屈服于任何一方。

大学的使命应是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高等教育发展的核心是学术和人才。因此，大学应成为理论创新、知识创新和科技创新的重要基地，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应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意义。上海政法学院是一所正在迅速兴起的大学，学院注重内涵建设和综合协调发展，现已有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语言学等学科专业。学院以“刻苦、求实、开拓、创新”为校训。这既是学校办学理念集中的体现，也是学术精神的象征。这一校训，不仅大力倡导复合型人才培养，注重充分发挥个性特色与

自我价值实现,提供自由选择学习机会,努力使学子们于学业感悟中启迪思想、升华精神、与时俱进,而且积极提倡拓展学术创新空间,注重交叉学科、边缘学科的研究,致力对富有挑战性的哲学社会科学问题的思考与批评,探求科学与人文的交融与整合。《上海政法学院学术文库》正是在这一精神理念引领下出版问世的。

《上海政法学院学术文库》的出版,不仅是《上海政法学院教育事业“十一五”发展规划》的起跑点,而且是上海政法学院教师展示学术风采、呈现富有创造性思想成果的科学平台。古代大家云:“一代文章万代稀,山川赖尔亦增辉”;“惟有文章烂日星,气凌山岳常峥嵘”。我相信《学术文库》的出版,不仅反映了上海政法学院的学术风格和特色,而且将体现上海政法学院教师的学术思想的精粹、气魄和境界。

法国著名史学家、巴黎高等社会科学学院院长雅克·勒戈夫曾言,大学成员和知识分子应该在理性背后有对正义的激情,在科学背后有对真理的渴求,在批判背后有对更美好事物的憧憬。我相信《学术文库》将凝聚上政人的思想智慧,人们将从这里看到上政人奋发向上的激情和攀登思想高峰的胆识与艰辛,上政人的学术事业将从这里升华!

祝愿《上海政法学院学术文库》精神,薪火传承,代代相继!

金国华

(作者系上海政法学院院长)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一、社会整合的困境	1
二、身份与身份认同	3
三、失地农民身份认同研究	15
四、本书的研究思路和方法	31
第二章 研究选点与研究对象	35
一、研究选点	35
二、研究对象	40
第三章 支撑农民身份的制度体系	44
一、新中国成立后社会结构的变迁及身份制度的形成	44
二、农民身份的权利	48
三、农民身份所承担的责任与义务	67
四、农民的社会流动	71
五、封闭制度下的底层身份	73
第四章 被建构的农民身份认同	76
一、Z 村居民的农民身份认同	76
二、农民身份认同的社会建构	86
三、总体性社会中的认同建构	99
四、国家主导下的认同建构	105
第五章 “农转非”后的制度安排	107
一、征地——强制性制度变迁	107
二、上海市征地制度	111
三、身份转变后获得的权利	118
四、仅仅是非农化的身份转变	131
第六章 “农转非”后的身份认同及其建构	134
一、新身份与新边界	134
二、权利与认同的主体性建构	145

三、身份与地位	161
四、“市民化”还是“属地化”	170
第七章 制度变迁与身份认同的重构	173
一、合法性认同	173
二、规划性认同	175
三、抗拒性认同	177
四、身份重构中的路径依赖	179
第八章 身份转变与市民化困境	182
一、市民化核心——市民身份	182
二、农转非身份与市民身份	184
三、市民化的制度困境	185
四、非市民化的身份认同建构	188
五、研究的反思	189
参考文献	192

第一章 绪 论

一、社会整合的困境

“整合与秩序”，是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社会学家长期以来关注的焦点。古典政治哲学家认为，社会秩序的形成是人类为了摆脱自然无序状态的必然结果，并将秩序的实现归结于“利维坦”式的人物或社会契约组织起的国家政权之上。但社会学所关心的社会整合，更多的是由社会身份系统参与达成的。身份系统的基本功能，是对社会成员所处的位置和角色进行类别区分，通过赋予不同类别及角色以不同的权利、责任和义务，在群体的公共生活中形成“支配—服从”的社会秩序，社会身份系统，以它特有的方式，将分散的个体凝聚成统一整体。

早期社会学家在解读社会整合过程时产生了不同的理论路径。一是如涂尔干，认为社会中所有的一切都依赖于一个合适的道德秩序以及相适应的社会及技术条件，社会学家们应该从具有客观性、集体性与强制性的社会事实中去探究维持社会整合与秩序的机制；二是如马克斯·韦伯，将社会现实还原为个体有目的的行动结果，从个体理性上寻找社会秩序维系的关键因素。这使得社会学在其学科形成初期就存在着个人行动与社会结构两种不同分析路径，它们各成一派，成为了西方社会学研究过程中无法摆脱的困扰。当代社会学的不少研究已经开始尝试在两者中寻找融合的可能性与可行性，尽管效果并不十分明显，但毕竟这种趋向融合的研究模式已是现当代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趋势。

同样，社会身份系统也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观察。一是常见的制度——结构方向，目的在于认识正式制度，包括法律规则和习惯民情，怎样在不同的社会成员中分配权利、责任和义务，从而以强制的途径达成秩序。二是则更关心社会成员的主动选择，目的在于认识他们对于自我身份的期待、接受和认同，亦即他们如何进行身份建构和选择。笔者认为，身份获得实际存在于两个并行的过程中，一个是制度的赋予，另一个是行动者认同的建构，它们相互影响，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各自对身份系统的形成与变迁起着不同的作用。传统意义上的身份具有等级、地位、特权等非现代（不平等、不流动）的含义；现代身份的意义则是建立在“平等”、“流动”之上的自致地位，可以看作是由认同所划定的心理界限。这种从西方历史上很

清晰的“身份到契约”的社会状态分野,在中国却时时纠缠不清。

因此,笔者认为,在中国分析社会结构因素对身份的构建应当从对各种制度的分析开始。所谓制度,应该是泛指以规则或运作模式,规范个体行动的一种社会结构。这些规则蕴含着社会的价值,其运行彰显着一个社会的秩序。当考察制度变迁时,笔者将其分为两种类型: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是指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它是由个人或一群(个)人,在回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强制性制度变迁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和实行。诱致性制度变迁必须由某种在原有制度安排下无法得到的获利机会引起。任何一种类型的制度变迁可能创造、确立、维护,或者相反,消除、破坏某种身份系统,从而使社会中的权威资源出现重新配置,使某一部分社会身份获得相对较优越,或相对较弱势的地位。在这个意义上,社会“身份”系统,意味着某些社会资源的配置安排,而社会身份系统的变化,意味着这些社会资源的重新配置。如果要分析行动者自身身份的建构过程,“认同”则是其关键要素,认同是行动者通过对其自身的定义,选择、接受和承认某种身份系统的过程,对强制性身份安排的不认同将最终导致整个身份体系的瓦解,同时也导致社会整合的失败。

这种“制度—身份”体系很自然地让失地农民群体进入笔者视线。当下中国,作为社会身份——“农民”,其产生实际上就是长久以来各种国家制度安排的结果。这个群体失去土地改变“农民”身份,很大程度上是政府以征地的形式,依靠强制性的制度安排而实现的;而征地后失地农民(如果他们还是农民)群体社会生活或多或少地也受政府引入的新制度的影响。社会成员的整合依赖于他们的身份关系结构的性质,随制度的变迁,其身份关系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化,新的社会整合过程也将随之发生。而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结构也在发生着变化,传统的“制度—身份”结构是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支撑的,而在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是否还能维持这样的结构仍有待考察。另一方面,作为“失地农民”,其与“农民工”所面对的制度与身份环境是截然不同的。“农民工”身份的获得是农民作为行动者,离开土地,自我选择的结果,而笔者所关注的“失地农民”其身份的失去完全是强制性的,而新身份的获得过程从很大程度上也是强制的,虽然新的身份可能要好于以往的农民身份,但相比“农民工”其身份认同转变时,面对的压力可能更大。

国家权力系统精心设计的制度安排,其目的是使受到制度变迁影响的人群能获得新的身份,整合到现代社会中维持社会既有的秩序。当前的这些制度安排的目的就是试图使失地农民群体平稳地从原先的农村生活体系过渡到城镇生活体系,实现农民向市民的身份变更。

在户口本上将“农”变为“非农”之后,这群人就要展开自己新的生活。笔者关注的是这群农民中,被安排或招募进当地工厂,从事工业生产那部分群体的身份认同状况。对这样的人群来说,由前现代农业社会一下进入了现代工业社会,原有的农业社区结构被打破了,来自不同村庄或生产大队的人在一起工作,隶属于工厂这一新的组织体制管理之下。而他们每天接触的同事中也增加了许多其他身份的群体,如传统意义上的上海市民和外来的农民工。总之,原有的社会组织体系被完全改变了。但走进了工厂的农民群体在新的制度环境下却产生了更多的不满,发生了不少矛盾与冲突,究其原因是对新的生活方式下权利与义务被重新配置合理化过程没有完成。身份认同是如何形成的,在身份转变过程中行动者如何界定自身在社会资源配置中的地位,成为了本文关注的主要问题。笔者在前期的走访调查中,发现失地农民群体内对自身获得的待遇表达了诸多的不满,而其他身份群体,如传统意义上的上海人则常发出“这帮乡下人以为自己是人啊?”的感叹与不屑。

他们对于新身份的认知与政府部门及其他身份群体对其所获得新身份的认知之间是否存在紧张关系呢?面对新的制度安排,这些从农业社会走来的“乡下人”的意识中如何描绘自己所处社会的结构体系,如何确定自己在此体系中的地位?这是本书关注的焦点。

根据诺斯的研究,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人们逐渐采取新规则来增进行动的合法性,以便能够更有效地利用新的经济机会。用社会学的语言进行表述,这实际上是重新定义社会成员的权利、责任、忠诚对象和认同规则。当前,我们正经历着这样的变化。这不仅反映在社会分层、法律对于财产利益授权的新变化,还反映在社会成员对于新旧权利、义务责任的认同正在发生变化。这些变化的一个证明,是社会成员在观念、规则、行为和利益方面出现大量的冲突现象。本文试图讨论的是,在一个强制性制度变迁的过程中,行动者对于其自身的定义,对新社会身份的选择、接受和承认。通过考察新制度条件下身份认同的建构过程,揭示制度变迁与身份认同的互相作用,为如何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保持社会整合提供参考,同时也为农民问题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二、身份与身份认同

“身份”这一概念已经成为社会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与类别、角色等概念相联系,揭示的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个体与社会的关系。身份是中国人话语体系中常见的词汇,身份的概念在个体意义上与英语中的“Identity”一致,而在社会意义上与英语中的“Status”近似。在个体意义上强调身体的区分和认同,身份就是“一

个个体所有的关于他这种人是其所是的意识”^①。而在社会意义上,是强调个体所处的文化认可的社会空间位置的标识或地位等级。

“一种社会定位需要在某个社会关系网络中指定一个人的确切‘身份’。不管怎样,这一身份成了某种‘类别’,伴有一系列特定的规范约束……某种社会身份,它同时蕴含一系列特定的特权与责任,被赋予该身份的行动者会充分利用或执行这些东西;他们构成了与此位置相联的角色规定。”^②

(一) 社会认同视野中的“身份”

作为“Identity”的“身份”起源于西方个人主体意识的崛起。西方对主体性的认识经历了实体主体性—认识主体性—生命主体性的发展过程。从近代起,“人是万物的尺度”成为人们的共识,当笛卡尔将思维当作哲学的基础时,在确定了我思维的同时,便也得出了我存在的结论。而反过来,没有存在的物质,思维就不可能存在。“作为存在的思维,以及作为思维的存在,就是我的确认,就是‘我’。这就是著名的 Cogito, ergosum(我思故我在)。”^③

认知主体性的理论是主体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它不仅把主体和人统一了起来,从而确立了人的中心地位和对世界的能动关系,奠定了人们对具有现代意蕴的主体性理解的基础。现代主体意识的崛起也催生了各学科对身份—认同这一概念的知识反应。

1. “身份”(Identity)研究的源起——对价值、意义的承诺与确认

“Identity”最初是一个哲学范畴,表示“变化中的同态或差别中的同一问题,如同一律。”^④哲学意义上认同问题的提出源自于作为社会主体的个人对于自身生存状况及生命意义的深层次追问。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把它表述为“我是谁”这一涉及人的安身立命的大问题,“回答这个问题就是理解什么对我们具有关键的重要性。知道我是谁,就是知道我站在何处。”我的认同是由提供框架或视界的承诺和身份所规定的,在这种框架和视界内我能够尝试在不同的情况下决定什么是好的或有价值的,或者什么应当做,虽然通常的方法是将 Identity 译为身份,但其包含了识别与归类的两重涵义,一是“本身、本体、身份”,是对“我是谁”的认知;一是“相同性、一致性”,是对与自己有相同性、一致性的事物的认知。在身份概念的内涵中,包含有对“我群”一致性的认知,同时亦伴随着对他群差异性的认知。因

① Peter Straffon & Nick Haes, A Student's Dictionary of Psychology, Edward Arnold, 1988.

②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三联书店 1998 年版,第 161~162 页。

③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 4 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 1978 年版,第 63~70 页。

④ 张海洋:《中国的多元文化与中国人的认同》,民族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39 页。

此,对身份的研究也就是对个人与社会、个体与集体、群体与群体关系的研究,或者应赞同或反对什么。换句话说,“这是我能够在其中采取一种立场的视界”^①。

哲学中的认同问题正是基本身份命题。我是谁?从哪里来?往何处去?它从人类启蒙之初就被辨识和提出,自始伴随着人类的成长而且似乎永无解答之日。“荒漠般的世界要求人们像朝圣者一样地生活。但由于生活已经变得像朝圣,人们身边的世界就会如同荒漠,毫无特色;尘世生活的意义将通过浪迹天涯来实现,它把生活变成通往意义所在地的朝圣征途。意义的这种‘引入’被称为‘建立身份’。”^②对自我身份的不断追问,是对人类自然家园和精神家园的双重探究,是对生命意义的终极关怀。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当代认同危机就是指人的自我身份感的丧失,也可以被理解为“自我价值感、自我意义感的丧失”^③。

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不仅表现在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的转变,更重要的是人类个体自身的转变。身份认同问题在传统的穆斯林社会中根本就不会出现,就像在传统的基督教社会里不会出现一样。在传统的穆斯林社会,个人的身份是被他的父母和社会环境给予的,从他所在的部落和亲友到当地的伊玛目到国家的政治结构的一切确定了个人在某个特定伊斯兰教派的身份,那是根本无法选择的^④。在传统社会中,个人与环境的社会建构过于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一直很难看到特别的个体化的行为。在现代社会中,个人在空间上、经济上、精神上都越出了原有的所属关系的界限^⑤。

2. 心理学中的身份认同——心理上的完整感和连续感

现代心理学意义上的“认同”一词最早由弗洛伊德(S. Freud)提出^⑥,指个人与他人、群体或模仿人物在情感上、心理上趋同的过程,是个体与一个人有情感联系的最初表现形式^⑦。埃里克森(E. H. Erikson)最早将其引入社会心理学,作为社会心理分析的一个技术术语来使用。受弗洛伊德的影响,埃里克森在20世纪40年代首先在他的青少年心理分析研究中使用“自我认同”一词^⑧,并从心理分析和功能的角度将其定义为一种“群体心理现象”。接下来他又进一步作了一系列的有关内在

① 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韩健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37页。

② 齐格旅·鲍曼:《生活在碎片之中》,郁建兴等译,学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92页。

③ 罗洛·梅:《人寻找自己》,冯川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5页。

④ Francis Fukuyama, Identity and Migration, http://www.prospect-magazine.co.uk/article_details.php?id=8239.

⑤ 参见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序论》,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2页。

⑥ 1915年弗洛伊德在《悲哀和抑郁症》这篇论文中,第一次提出“认同”这个术语。

⑦ 王亚勋:《少数民族认同研究的现状》,《心理科学进展》2002年第10期。

⑧ 世瑾:《宗教心理学》,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

认同、认同扩散、整体与认同、族群认同、生命过程的认同发展等研究。

艾里克森在弗洛伊德认同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同一性”概念,他搜集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和实证依据,对同一性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并于1958年系统地提出了他的同一性发展理论。根据艾里克森的理论,自我的基本功能是建立并保持自我认同感。自我认同感是一个复杂的内部状态,它包括了我们的个体感、唯一感、完整感以及过去与未来的连续性^①。埃里克森认为,“由于现代社会从本质上是不断变化的、矛盾的和不确定的,因而认同危机已经是现代人的典型的传记性的危机。”与弗洛伊德认为人格发展是由其早期经历所决定的观点不同,埃里克森认为人格发展是终其一生的事情,“人格发展的每个阶段是由认同危机来定义的,一个稳定的自我认同源自于对这些认同危机的解决。”^②

心理学侧重自我和认同的研究,认为认同的达成就是实现心理的完整、统一、连续感。而社会心理学更明确地肯定了认同与群体的关系。社会心理学对认同的基本解释是将认同看成群体关系的系统,每个人属于不同的群体,而每个群体作为一种社会认同标识代表着个人意识。社会存在着不同的群体,属于这些群体的个人经常以这些群体成员的一分子来界定自己的身份。这样的自我界定和归属,是形成个人社会态度的重要基础之一。因此,尼尔·米勒(Neal Elgar Miller)指出,认同的本质不但是“心理”的,它也包含“群体”的概念,是一项自我的延伸,是将自我视为一个群体的一部分。^③事实上,在北美的心理学传统中,多用自我来表征认同“identity”上的意义。相反,在欧洲的传统中,常用身份来强调群体成员身份的角色和群体之间的联系^④。在心理学上,identity的认同之意指向内在的统一协调及其持续。就人来说,强调的是人格、心理品质的确定性、统一性和稳定性,所体现的是一个个体所有的关于他这种人是其所是的意识,而这正是身份的意义所在^⑤。

3. 社会学理论中的身份认同——寻找个人与社会的边界

和心理学比较,社会学对认同的界定更强调认同的社会制约性。乔治·米德(George Mead)的符号互动论以自我为核心概念,他认为一个发达的、完整的自我

① Jerry M. Burger:《人格心理学》,陈会昌译,轻工业出版社2000年版,第80页。

② 戴维·波普诺:《社会学(第十版)》,李强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1页。

③ 梁蕊萍:《中国人的宗教心理——宗教认同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页。

④ Bernd Simon, *Malden Identity in Modern Society A Social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Oxford, UK: Blackwell pub., 2004.

⑤ Peter Straffon & Nicky Hayes, *A Student's Dictionary of Psychology*, Edward Arnold, 1988.

意味着,人们能够比较确信,自己赋予一个符号的意义与他人所赋予的意义大体一致,也就是说,一个发达的自我既包容社会又创造社会。当自我能够把自己发生互动的他人的意向整合进一套一般性的行为标准,当自我扮演一般化他人的角色的时候,自我就达到了发展的最高阶段。自我和社会不再被看作分离的,个体成为自己对周边社会的思考^①。米德认为,认同是主体选择性与社会关系的互动过程,主体只有融入社会团体并与该团体的其他成员进行交往,才能实现个人的认同^②。“社会成员这样被组织起来,是为了更好地社会性地采取行动……通过采纳他人对这些行动的态度来实现……”^③

受米德开创的符号互动论的启发,耐尔森·富特(Nelson Foote)将人的动机解释为对某一群体认同的结果。富特对身份认同的界定是“对某一特定身份或一系列身份的占有和承诺”。富特认为,身份认同是一个过程,是通过命名(naming)来进行的:认同的概念是有关自我的产物。认同特别强调对立面,也就是重要他者的认可。彼得·伯格(Peter. L. Berger)认为,认同是社会给予、社会维系和社会传递。

20世纪60年代以来,女性主义、黑人民权、同性恋、少数族群争取权利、宗教复兴、嬉皮士等一系列社会运动席卷了英国、美国、法国等西方发达国家^④,各种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将认同研究扩展到了更为宽广的领域。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认同”逐渐成为一个综合的概念,“情境”被引入了有关认同的研究中。格里高利·斯通(Gregory Stone)为认同下了一个简洁的定义:认同是个体在情境中所获得的一种意义,而且认同是不断变化的。这一概念将认同与社会关系联系起来,因为情境本身就是由个体对其在社会关系中的参与和成员身份的认知所型塑的。

戈夫曼在其《污名:关于被损害了的认同的管理笔记》(1963)一书中继续分析了情境中的自我,并将之用于对被污名化的群体的研究,分析他们如何呈现或试图隐藏被污名化的自我。戈夫曼将认同进一步细分为社会认同、个人认同和自我认同,并利用这种区分将“污名”定义为“特性与刻板印象之间的一种特殊关系”。

皮特·伯格在《社会学导论》(1963)一书中讨论了认同与角色理论的关系,并在其后的一系列研究中将个人认同与社会过程联系起来,发现认同与其他意义一样是社会建构的,各种认同类型都不过是社会实在。而个人认同只是活跃于个人

① [澳] 马尔科姆·沃特斯:《现代社会学理论》,杨善华等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28~29页。

② 孟樊:《后现代的认同政治》,扬智文化事业出版公司2001年版,第312页。

③ George Herbert Mead, *Mind, Self, and Society*, pp. 261-262.

④ 关于这场运动的描述可参见贝尔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第113~124、169~196、227~251页;塞德曼的《有争议的知识》,第163~192页。

经验并镶嵌于个人身体中的社会实在。认同研究的发展在社会学的一般理论研究中也具有一席之地。帕森斯认为,由于当代社会结构的不断分化,导致了社会角色的多元化,使得认同成为一个“时尚的术语”。罗伯特·贝拉则讨论了认同与宗教的理论关联,认为认同是宗教的一个基本的、普遍的功能。

汉斯·摩尔(Hans J. Mol),将认同—宗教的连结进行了扩展,他们认为宗教在任何社会中都具有建立个人认同的基本功能。莫尔把宗教界定为“认同的神圣化”,这样认同就成为宗教理论分析的核心问题。他认为以个人层次而言,认同是一个人在混沌环境中所占据的稳固方位,个人能够据之对外在环境做出积极的防御;在社会层次而言,认同是一个基本的及普遍拥有的信仰、模范及价值之综合,它能抵抗外在事物对本身环境与成员的威胁及继续自身^①。认同可以解释为一种对“边界”的认知,区分了“团体内”和“团体外”的事物特征,形成了“身份”的保护屏。

在20世纪70年代,认同研究一方面更多地应用于经验研究,另一方面也逐渐理论化。在微观层面上,基于符号互动论传统的研究仍占主流。斯特赖克(S. Stryker)及其同事致力于通过认知、影响、行动领域来研究多重认同的呈现、功能以及转换关系,并将这种方法称为“身份理论”。认同理论试图将社会心理学与社会学连结起来,使用的是定量研究的方法。对性别认同的研究亦是这一时期认同研究的主流之一。

在组织层面上,有关制度认同的研究将个人与社会运动联系起来。查尔斯·泰勒与弗朗西斯·福山都将20世纪60年代以来,女性主义、黑人民权、同性恋、少数族群争取权利、宗教复兴、嬉皮士等一系列社会运动看作是围绕着特殊群体和个人展开的争取平等认可的运动而非以往于民族国家框架内的阶级利益和公民权为核心的政治斗争^②。布朗特认为认同政治是一场围绕着性、性别和种族等组织起来的运动,其目的是将“个人的就是政治的”付诸实践的方式,起点在于人们的政治活动和努力关系着塑造和重塑我们自身及与他们的关系,是“成为政治的”一种新的表达方式^③。贝斯特和凯尔纳直接将这场运动定义为后现代政治运动,它聚集在认同政治和差异政治两面旗帜之下,差异政治凭借被现代政治所忽略的范畴(如种族,性别和性偏好等)来建立新的政治团体,认同政治是试图通过政治斗争和政治

① 梁丽萍:《中国人的宗教心理——宗教认同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4页。

② 参见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的人》,黄胜强等译,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③ Rosalind Brunt, 1989,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in *New Times: the changing face of politics in the 1990s*, (eds) by Stuart Hall and Martin Jacques. London: Lawrence & Wishat.

信仰来建立政治与文化认同,以此作为政治动员的基础的政治运动^①。邦迪将认同定义为认同政治是已经存在的身份(identity)的发现或再发现;认同政治是对多重身份的解构与建构,以为了抵抗和削弱主导的旨在维护特定的权力关系的意识神话,是一种反抗性的狂欢^②。吉登斯也认为这场运动是一场“生活政治”,是在后传统秩序中追问“我们应该怎么生活”^③。而泽睿特斯凯则直接说认同政治具有两个主要特征:第一,强调差异而不是共性;第二,强调地方性或者特殊的身份共同体而不是共性^④。

在宏观层面,认同问题也进入了主流的社会理论中。法兰克福学派的批评理论家哈贝马斯试图融合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理论,从社会进化和个人发展的角度阐明两者潜在的相同之处。他认为社会认同是从初级神话和亲族基础发展到当代理性和沟通关系的。哈贝马斯将当代心理分析、社会学和发展心理学关于个人认同的观点融合成为一种综合的、标准化的观点:认同的一种意义是建立在沟通能力、理性和容忍之上的。哈贝马斯为分析认同提供了一种有历史背景,又有利于解放的观点。

罗兰德·罗伯森(Roland Roberson)和波卡特·豪兹纳(Burkart Holzner)在1979年编辑出版的《认同与权威:社会理论的探查》(Identity and Authority: Exploration in the Theory of Society)中,进一步将认同的研究纳入了社会学的主流。这些文章的作者有着心理分析、符号互动论和知识社会学的传统,并结合经典社会学理论和功能主义(如帕森斯)的理论,以及哈贝马斯的批评理论。这些文章审视了一些宏观论题,诸如社会进化与稳定性,社会 and 自我的现代化,普遍意义上的权威模式与认同代码间的关键联系等。认同与权威一样成为社会理论的核心议题。同样试图在一个更广大的“Identity”范围上建立宏大理论的还有曼纽尔·卡斯特,在1997年出版的《认同的力量》中,其将“Identity”定义为在文化特质或相关的整套文化的基础上建构意义的过程,而这些文化特征是在诸意义的来源中占有优先位置的;认同是行动者经由个别化过程而内化构建的,是行动者意义的来源,并将其划分为合法性认同、拒斥性认同及筹划性认同,三者分别对应公民社会、公社

① 斯蒂文·贝斯特、道格拉斯·凯尔纳:《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6页。

② Liz, Bondi, Locating Identity Politics. in Place and Pacastells of Identity, by Michael Keith and Steve Pile, London and New York: Rutledge, 1993.

③ 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现代晚期的自我与社会》,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52~253页。

④ Eli, Zaretsky, Identity Theory, Identity Politics: Psychoanalysis, Marxism, Post-structuralism. In Social Theory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eds) by Craig Calhoun. Massachusetts: Blackwell, 1994.